

# 关于《贞观政要》明刊本的考释与疑问

向辉

已公布的两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均收录了明刊本《贞观政要》十卷(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为 01528、01529、03826-03842)，但对该书的版本还存在一些待考证的细节。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该书的明刊本情况进行概要介绍，以备详考。

## 1. 《贞观政要》明刊本及其现存状况

《贞观政要》十卷系唐吴兢著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二、《新唐书》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五十七记载，吴兢，汴州浚仪（今河南开封）人，主要生活在唐高宗到唐玄宗统治时期。吴兢一生经历颇为复杂，既是官员（先后在中央和地方任职多年）也是学者（参与编辑国史多年并有私传前朝历史、撰《贞观政要》等书），还是藏书家（聚书颇多，藏书逾万卷，尝目录其卷第，号《吴氏西斋书目》）。据谢保成<sup>1</sup>《贞观政要集校》考证，《贞观政要》十卷内容即为对唐太宗朝君臣讨论探求国家治理之道的言论集，包括君道、政体、任贤、求谏、纳谏、君臣鉴戒、择官、封建、太子诸王定分、尊师傅、教戒太子诸王、规谏太子、仁义、忠义、孝友、公平、诚信、俭约、谦让、仁恻、慎所好、慎言语、杜谗佞、悔过、奢纵、贪鄙、崇儒学、文史、礼乐、务农、刑法、赦令、贡赋、辩兴亡、征伐、安边、行幸、畋猎、灾祥、慎终等篇。

谢保成<sup>2</sup>认为，吴兢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（729）上《贞观政要》十卷（含《上贞观政要表》、《贞观政要序》）并因书获责（“书事不当”），被玄宗赶出京城，做荆州司马，此时吴兢近六十岁。因为唐玄宗对吴兢上的书不感兴趣，所以此书在吴兢在世之时并未刊行，直到吴兢死后若干年才有各种版本出现，包括吴兢的稿本、底本、进呈本、蒋义整理本及各种抄本等。《贞观政要》一书由于其中的政治智慧，唐亡后几朝便逐渐流行，甚至有契丹文、西夏文、女真文和八思巴蒙古文的译本出现<sup>3</sup>，同时也流传到日本、韩国。多本并行的结果是“传写谬误”不可避免，因此就有了元戈直的集论本。戈直本于元顺帝至元四年（1333）刊行后在明代又有多次重刊。

初步检索明清藏书目录，诸多目录载有《贞观政要》一书，如《文渊阁书目》<sup>4</sup>、《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录》<sup>5</sup>、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<sup>6</sup>、《万卷堂书目》<sup>7</sup>、《晁氏宝文堂书目》<sup>8</sup>、《百川书志》<sup>9</sup>、《赵定宇书目》<sup>10</sup>、《脉望馆书目》<sup>11</sup>、《世善堂藏书目录》<sup>12</sup>、《玄赏斋书目》<sup>13</sup>、《澹生堂藏书目录》<sup>14</sup>、《徐氏家藏

<sup>1</sup>谢保成：《贞观政要集校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。

<sup>2</sup>谢保成：《贞观政要集校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，第12页。

<sup>3</sup>周峰：《〈贞观政要〉在辽西夏金元四朝》，《北方文物》2009年第1期，第75页。

<sup>4</sup>杨士奇等：《文渊阁书目·卷五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53页。

<sup>5</sup>李廷相：《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录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488页。

<sup>6</sup>佚名：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523页。

<sup>7</sup>朱睦（木+掣）：《万卷堂书目·卷二·杂史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585页。

<sup>8</sup>晁（王+栗）：《晁氏宝文堂书目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622页。

<sup>9</sup>高儒：《百川书志·卷四·故事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726页。

<sup>10</sup>赵用贤：《赵定宇书目·天字号·史书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829页。

<sup>11</sup>赵琦美：《脉望馆书目·宇字号·编年门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四·明代卷第一册》，第896页。

<sup>12</sup>陈第：《世善堂藏书目录二卷·卷上·典志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五·明代卷第二册》，第29

书目》<sup>15</sup>、《笠译堂书目》<sup>16</sup>、《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》<sup>17</sup>等，除了《百川书志》将题目记为《贞观故事政要十卷》之外，其他各目均记为《贞观政要》或不记卷数或记为十卷。古代藏书目录多为品种目录，仅载书名卷数而已，罕有记载版本情况者，这就为考证、辨别《贞观政要》十卷在有明一代的刊刻情况带来很多不便。不过明周弘祖<sup>18</sup>撰《古今刻书》二卷很清楚地记载了《贞观政要》一书在明代的刊刻机构，包括内府、南京国子监、福建书坊、四川蜀府等地。明刘若愚<sup>19</sup>撰《内板经书纪略》一卷还记载了内板的《贞观政要》有八本三百七十叶。张之洞<sup>20</sup>《书目答问》卷二“史部·杂史类”记载了《贞观政要》十卷的一种明本，即明经厂本（另外还记载了清初朱载震大字本一种），朱学勤<sup>21</sup>撰《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一卷》中也记载了明经厂本《贞观政要》十卷。

另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<sup>22</sup>，现存大陆公藏的《贞观政要》十卷明刊本的情况如下：

书坊刊本两种：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刻本（现存国家图书馆）、明洪武二十三年范氏遵正堂刻本（现存常熟图书馆）；

内府一种：明成化元年内府刻本（26家藏）；

藩府一种：明成化十二年崇府刻本（11家藏）；

另有一种不明刊刻机构：明刻本（8家藏）（或定为明成化刻本<sup>23</sup>）。

下文将从书坊刻本、中央机构刻书机构刻本与藩府刻本等三个方面详细介绍。

## 2. 书坊刻本

明太祖免除前代的书籍税，允许各种机构较为自由地刻书，一时间书坊林立，产品颇多，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均有涉及。戚福康<sup>24</sup>甚至认为我国书坊的成熟时期为明代，因为明代书坊达到了古代书坊发展的最高水平，其直接表现为书坊林立、分布全国、刊刻书籍数量极大、书籍品种极多、刊本质量可观等。国内现存明代书坊刻《贞观政要》主要有两种版本体系，一为勤有堂刻本，一为遵正堂刻本。

据瞿冕良<sup>25</sup>《中国古籍版刻词典》载：王氏勤有堂为明洪武年间润州人王敬仁的室名。曾刻印唐吴兢《贞观政要》十卷（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），《魁本对相四言杂事》不分卷（四行八字，上下二栏，左图右字），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《遗文》一卷《传》一卷（十三行二十三字）。

---

页。

<sup>13</sup>董其昌：《玄赏斋书目卷二杂史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五·明代卷第二册》，第71页。

<sup>14</sup>祈承（火+業）：《澹生堂藏书目录十四卷·卷四·史类第五约史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五·明代卷第二册》，第181页。

<sup>15</sup>徐（火+勃）：《徐氏家藏书目七卷卷二旁史类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五·明代卷第二册》，第300页。

<sup>16</sup>王道□：《笠译堂书目杂史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五·明代卷第二册》，第518页。

<sup>17</sup>朱学勤：《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一卷》，贾贵荣、王冠辑，《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06页。

<sup>18</sup>周弘祖：《古今刻书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六·明代卷第三册》，第150、152、164、173页。

<sup>19</sup>刘若愚：《内板经书纪略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·六·明代卷第三册》，第202页。

<sup>20</sup>张之洞著、范希曾补正：《书目答问补正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96页。

<sup>21</sup>朱学勤：《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一卷》，贾贵荣、王冠辑，《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606页。

<sup>22</sup>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223、1640页。

<sup>23</sup>北京图书馆编：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23页。

<sup>24</sup>戚福康：《中国古代书坊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7年。

<sup>25</sup>瞿冕良《中国古籍版刻词典》，齐鲁书社，1999年，第603页。

李致忠<sup>26</sup>认为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余氏勤有堂刊印之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；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·集部》<sup>27</sup>载“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载明洪武十五年勤有堂刻本（十三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）”。又有杜信孚、杜同书<sup>28</sup>《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·江苏省书林卷》载：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》，明洪武十五年江苏省书林王宗玉勤有堂刊本。李汉序后有牌记，文曰：“韩柳二先生文集行世久矣，唐季历宋以来，儒人文士莫不宗之，以为文章之模范，序记之矜式，惜旧版漫灭，续集遗阙，读者憾焉。本堂广求访到善本，卷集全备。宗玉喜不自胜，命工鼎新绣梓，以广其传，使四方文学君子得睹，二先生全文不致湮没，岂不伟与。辛亥岁戊辰十月吉日书林王宗玉识。”序后有“洪武庚戌仲冬王氏勤有堂刊”篆文牌记。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三字，黑口，四周单边。未知孰是。

据《中国古籍版刻词典》载：遵正书堂一作尊正堂。明洪武间人范姓的书坊名。刻印过宋何士信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》前集二卷后集二卷（半叶十四行，行二十三字），唐吴兢《贞观政要》十卷（十三行二十四字）<sup>29</sup>。

其中勤有堂刊本唯有国家图书馆藏两部，未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经初略比对国家图书馆与常熟市图书馆藏本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3826），笔者发现，国图藏勤有堂刊本有序、有表，但序、表字体与正文字体完全不同，部分文字的写法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，似为后补。但正文部分与常熟藏本极为相似，包括行款、字体、书口以及部分异体字、简化字的写法等。但国图藏本并没有牌记，至于如何确定为勤有堂刻本待考。由于缺乏相关资料，暂时无法考证这两种明初书坊刻本之间的关系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就刻书风格而言，早期书坊刻书较为随意，延续元代刻书风格，政府控制稍弱。以《贞观政要》为例，现存明本中，仅有的两种民间刻本，均为明洪武年间书坊所为。此时的刻本与元代坊刻本特征极为相近，如大量简体字或异体字的存在，在明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范氏遵正堂刻本卷一第一叶中就有观、第、须、取、楚、所、世等若干简体字或异体字，与后来的其他明刊本有着显著的差别。按照李致忠<sup>30</sup>所归纳的元刻本的特征“黑口、赵字、无讳、多简”的特征来看，早期明本比较符合元刻本的这些特征。这是由于元亡不久，刻工多为前朝遗民，因而刻书风格与前朝并无大异。

### 3.中央机构刻书

有明一代，官刻之书品种丰富，刻书机构繁多。现存最早的中央机构刻本《贞观政要》十卷为明成化元年（1465）内府刻本（有两种可能性，一为南京国子监本，一为北京内府本），明周弘祖撰《古今刻书》、明刘若愚撰《内板经书纪略》均有记载。清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记为明经厂本，明周弘祖撰《古今刻书二卷·上编》载《贞观政要》有内府本和南京国子监本。

南京国子监不但储集了元集庆路儒学旧藏的各路史书版，又接收了元代杭州西湖书院（南宋为太学）所刻版片，汇编刊印了众多史籍，其中就有《贞观政要》<sup>31</sup>。据李致忠<sup>32</sup>著《古代版印通论》、张秀民<sup>33</sup>著

<sup>26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60页。

<sup>27</sup>北京图书馆编：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050页。

<sup>28</sup>杜信孚、杜同书：《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·江苏省书林卷》，线装书局，2001年，第21页。

<sup>29</sup>瞿冕良：《中国古籍版刻词典》，齐鲁书社，1999年，第644页。

<sup>30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12页。

<sup>31</sup>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43-243页。

<sup>32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年。

<sup>33</sup>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。

《中国印刷史》、赵前<sup>34</sup>著《明本》介绍，明朝建立后，内府早期的刻书，是皇宫内的一些机构负责。司礼监成立后，内府刻书，逐渐由司礼监所管辖的经厂接替完成。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制，为内廷十二监之首，二十四个衙门之一。经厂的刻书规模随着司礼监权力的不断扩大而发展，监中专司镌刻印刷的工匠也随之变化。司礼监设有汉经厂、番经厂、道经厂，因此后人称其所刻本为“经厂本”或“厂板书”，经厂本多是黑口、白纸、赵体字<sup>35</sup>。内府刊本在南京刊刻之后又到北京内府再刊似为明代特色。

李致忠<sup>36</sup>先生将明代刻书的版式特点概括为前期“黑口赵体继元”、中期“白口方字仿宋”、后期“白口长字有讳”。明初至正德（1368-1521）一百多年间刻书的版式，官雕与私刻的大多数书籍有“黑口赵字”的版式风格，其缘由颇多，其中最为主要的为继承和墨守：第一，入明以后，朝代虽然变了，但很多元朝旧有的书坊（书林）和刻工，其刻书风格未有新的变化。这种风格主要是指刻书风貌和刻书字体，其根本归结可以说是刻书工匠与刻书政策。明初徭役制度采取住作匠和轮换匠的办法，内府的刻书工匠，大概已经习惯了原有的刻书方法和刻书流程，因此内府刻本与前朝较为一致，即多为粗大黑口的版式风格，而刻书字体，也和版式风格一样，仍然仿效赵孟頫字体，没有太大的变化。当然，这种版式与字体只能说是大体相似。

第二，明代中央集权体制较为完善，中央政权虽然鼓励刻书、印书，但对书籍的刻印还是有一定的要求，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严格控制官刻书籍的刻书款制，容易形成一体化的版式风格。特别是明代的官书和儒家经典，一经政府颁刊，各地便只能照式翻刻，其版式风格特点很难区分。如《大诰续编·颁行续诰第八十七》有“敢有仍前故意差讹，定所司提调及刊写者，人各治以重罪”语，叶德辉<sup>37</sup>《书林清话》卷七记载“明时官刻书，只准翻刻，不准另刻。世传闽中刻《五经四书》，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：……再不许违官式，另自改刊。如有违谬，拿问重罪，追版划毁，决不轻贷”云云。

《贞观政要》一书经中央（先为南京国子监其后是北京司礼监）正式颁行，如果地方要再刻此书，似乎必须与内板格式一致，版式风格难以区分，但这种一致性并不能保证一摸一样，只能是某些方面类似，细致考察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差异。国内公藏《贞观政要》十卷中一个主要的版本体系为成化元年内府刻本，不过哪些是内府原版似难以一一核实。一般而言，内板书有“廣運之寶”朱文方印、书品宽大、字体流畅（书法仿赵体，方正圆润）、纸白墨黑、波浪型双黑鱼尾，颇有宋版遗韵，如哈尔滨市图书馆藏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3828）。而青海民族学院图书馆藏本（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 01528）似与此有细微差异，主要表现在字体略显呆滞、鱼尾形状似非波浪型等。该书是否为内板翻刻抑或是藩府刻本待考。青海民族学图书馆藏本钤有“黄绍斋家珍藏”印。黄绍斋为近代藏书家、集邮家，藏书以明版居多。

#### 4. 藩府刻本

明王朝分封的各个亲王府即为藩府。有明一代，皇诸子中受封为王的先后有 62 人<sup>38</sup>。明代藩府刻书为各代所无，藩府成为刻书机构是明代出版事业特有的现象，在此之前的宋元，在此之后的清代，都没有这种现象<sup>39</sup>。藩本既多且精<sup>40</sup>，然质量不等，不过大都较为考究。中央政府限制藩王参与政治斗争，但在其

<sup>34</sup>赵前：《明本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3 年。

<sup>35</sup>毛春翔：《古书版本常谈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63 页。

<sup>36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268-270 页。

<sup>37</sup>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》，耿素丽点校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122-123 页。

<sup>38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237 页。

<sup>39</sup>缪咏禾：《明代出版史稿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59 页。

他方面限制不多，且有一定经济实力，用李致忠先生<sup>41</sup>的话说，这些藩王大多既是有钱阶级又是有闲阶级，所以很多藩府从事文化事业，对于藏书刻书较为热衷，并成为一种风气。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，迄于崇祯季年，与朱明一朝相始终。刻书最早的有周、蜀、宁三府，此三府刻书陆续经历二百年左右<sup>42</sup>。明代藩府刻书大约有几百种，之所以受到历代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珍重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藩府刻书以宋元版为底本，翻刻了很多珍稀罕见的古籍。……藩府刻书作为明代贵族正统文化的体现，数量虽少，却颇具代表性<sup>43</sup>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明代藩王刻书多达 250 余种，而实际刻书数量尚不清楚。藩府刻书一般较为考究、翻刊有据、校讎有凭，故多为后来学者与版本学家所重，如叶德辉<sup>44</sup>云：“诸藩时有佳刻，以其时被赐之书，多有宋元善本，可以繙雕，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”。

明周弘祖撰《古今刻书》仅录四川蜀府一家刻《贞观政要》，《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·藩府》<sup>45</sup>中仅记录了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崇府刊本，张秀民<sup>46</sup>《明代藩府印书表》载《贞观政要》十卷藩府刻本有蜀王府和崇王府两家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大致确定明代藩府中有蜀王府和崇王府两家刻过《贞观政要》一书。两府刻书时间与刻书风格各有差异。

其中蜀王朱椿为明太祖第十一子，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就藩成都，传九世。蜀王府刻书品种很多，将近四十余种。不过蜀府刻本有哪些具体特征目前尚无专门研究。蜀王府刻《贞观政要》极有可能没有牌记，同时又与内府本极为相似，因此较难辨识。现存各种藏书目录所记载的《贞观政要》未见著录为蜀府刻本者，似与蜀府本的特征并不明显有关。

崇府为崇简王朱见泽，明英宗朱祁镇第六子，天顺元年封，成化十年（1474）就藩汝宁府，传六世。崇王府刻本为成化十二年刊，因有“成化丙申崇府重刊”牌记，识别较为容易。崇府本与成化元年内府本差异较小，仅在鱼尾、字体上有细微差异。崇府鱼尾为直线型，字体仿内板，但个别字略微有些差异，主要在用笔的流畅方面不如内府本。其他方面（诸如印书纸、用墨、刻工）的差异则待考。

## 5. 两个疑问

关于《贞观政要》的版本问题，似乎极为简单，但细致考察之后会发现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特别是国内现存的各种不同版本的《贞观政要》究竟为成化元年内府本还是成化后其他版本，目前尚无确切定位。另外，根据笔者的初步考察，发现另外两个关于《贞观政要》明刊本的问题：

第一，明初两种书坊刻本之间有何联系？为何两种不同版本在正文内容中的简化字、异体字、书叶版式、行款格式等方面极为相似？

第二，蜀王府刻《贞观政要》与内府刻《贞观政要》有何差异？蜀王府刻本与内府刻本之间有何差异？如何断定某一书为蜀王府刻本？

这两个小问题与我们确认明刊本《贞观政要》的版本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还有待进一步考察，还望各位方家不佞赐教。

---

<sup>40</sup>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82页。

<sup>41</sup>李致忠：《古代版印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38页。

<sup>42</sup>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85页。

<sup>43</sup>赵前：《明本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8-29页。

<sup>44</sup>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》，耿素丽点校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80页。

<sup>45</sup>杜信孚、杜同书：《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·藩府》，线装书局，2001年，第3页。

<sup>46</sup>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97、306页。